

文章编号: 1673-047X(2010)-05-0040-03

云冈石窟佛塔的汉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范鸿武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过去云冈石窟佛塔汉化的研究多数是从建筑学的领域来进行, 没有上升到民族文化的哲学高度来看问题, 没有从中华文化的性格、特质来论述。这里以云冈石窟佛塔为例, 以云冈石窟佛塔的汉化为切入点, 力图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活力、发达的应变机能, 探讨中华文明包容、吸纳、融合、改造、同化异质文明之旺盛生命力, 探讨中华文明的特性、适应能力、创新力、生命力和优越性。云冈石窟是中国本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云冈石窟佛塔的汉化是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化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缩影。

关键词: 云冈石窟; 佛塔; 汉化; 中国传统文化; 印度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众所周知,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 中华文明与古印度文明接触最为密切, 相互交流时间也最持久, 不过, 若论起相互作用的程度, 中华古文明对古印度文明的影响较小, 古印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深, 而这一切主要都体现在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上。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 至今已 2 000 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 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在一起。佛教与各地区的精神文化和各地区的物质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本土的精神文化如哲学宗教思想、信仰、伦理等结合在一起, 它也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本土的物质文化如建筑、装饰、雕塑、服装等结合在一起。

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 但佛教传入中国后, 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 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中国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

与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 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与改造并产生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面貌的历史进程一样, 中国佛教石窟寺虽然与印度佛教石窟寺有渊源和继承关系, 但来源于印度佛教建筑的石窟寺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 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 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并产生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石窟寺的新面貌。

中国石窟寺建筑不同于印度石窟寺建筑的新面貌是多方面的, 其中佛塔的汉化是印度佛教建筑、印度佛教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改造之后, 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的文化适应现象例证之一, 是中国石窟寺建筑最显著的新变化之一, 也是中国石窟寺建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是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由国家皇权主导的石窟营造壮举, 体现了帝王的意志和国家信仰。云冈石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早期的代表。云冈石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云冈石窟佛塔是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化这一重要文化传播现象的缩影。

云冈石窟中有许多佛塔的实物和雕刻, 云冈石窟形制多样的佛塔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塔庙窟中的中心塔柱, 洞窟壁面上浮雕的塔以及第三窟前室窟顶东西两侧三层方形塔和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四角各雕刻九层楼阁式塔, 共计有 90 余座。

塔, 又称为佛塔, 俗称宝塔, 梵文为 **Stupa** 译为窣堵坡, 又称浮图、塔庙、支提等, 本义为坟冢。

佛塔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要的建筑物。佛塔作为佛教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本来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来到中国的, 起源于印度, 是外来的东西。原本在印度佛教中叫“窣堵坡”, 是埋葬佛祖及僧人的佛骨舍利子的, 其实是坟墓。塔在古印度的初始形态是呈半圆球状的覆钵形(图 1)如同一个实心的半球体, 顶上做塔刹, 地面上沿其周围做一圈回廊, 外用石栏杆圈起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门如同牌坊形状, 人们就围着这一圈回廊进行佛事活动。

在汉字中原来并没有“塔”这个字。“塔”最早出现在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是印度“窣堵坡”音译“塔婆”的省音字。塔汉末传至中国后, 形成“上累金盘, 下为重楼”的中国式佛塔。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塔有两种: 第一种塔是塔柱, 第二种塔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图 1 印度支提窟

收稿日期: 2010-06-25

作者简介: 范鸿武(1967—)男,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学。

就第一种塔而言,塔柱是个立体的石柱,四面雕刻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支提窟中的支提塔是纯粹的信仰之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僧众围绕塔柱礼拜供养。北凉时期建造的敦煌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面都雕刻佛像。云冈第四窟、第六窟,也是如此在塔柱四面雕刻佛像的,它们受敦煌石窟的影响是应当没有疑问的。

由印度支提塔演变为中国的四面雕刻佛像的塔柱,中间应有其过渡形式。

稍晚的塔柱,中间的佛像缩小了,柱全体成为小楼阁式的塔,每个面雕刻着檐柱、斗拱,当中雕刻门拱形,浮雕佛像,佛像坐在门拱里面。虽然因为塔连着窟顶,塔本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的确可以当做当时木塔很好的模型。

我们已经见不到与云冈石窟同时或更前的木构建筑了,但《魏书》中有许多建立多层浮图的记载,而且《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木塔,如熙平元年(516年)胡太后所建的永宁寺九层浮图,距云冈开始造窟仅五十余年,木塔营造的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程度,可见半个世纪前,三五层木塔,必定已经很普通。根据史料来研究,可以断定木造楼阁的历史无疑已经有相当年代,如《后汉书》陶谦传,说“苻融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而汉代雕刻中,重楼之外,陶质冥器中,有与塔形很类似的五层小阁,每上一层面阔且递减(图2)。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云冈石窟塔柱或者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模仿当时木塔而雕刻的,绝对不是主观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窟石刻塔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质仿刻模型。

属于这种的云冈石窟独立塔柱,共有五处,平面都是方形,排列如下:

第一窟 二层 每层一间(图3)

第二窟 三层 每层三间(图4)

第四窟 中部东山谷中塔柱窟

第六窟 中间四大佛像 四角四塔柱 九层 每层三间

第三十九窟 五层 每层五间(图5)

上列五个塔柱,以西部第三十九窟的塔柱为最大,保存最好。塔下原有台基。上边五层重叠的阁,面阔与高度呈递减的形式,也就是上层面阔与高度,比下层每次减少,使外观安定稳重而隽秀。这是中国木塔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个重要特征频繁见于北魏云冈石窟雕刻上,可见当时木塔主要形式已经是如此,只是平面形式较单一,似乎尚局限于方形。

至于建筑主要各构成部件,在塔柱上也雕刻完备。塔柱最上层由于需要支撑洞窟的天顶,所以并没有浮雕塔上所雕刻的刹柱相轮等。除此之外,塔柱所表现建筑各部,都是北魏木塔难得的参考物。



图2 汉代冥器五层楼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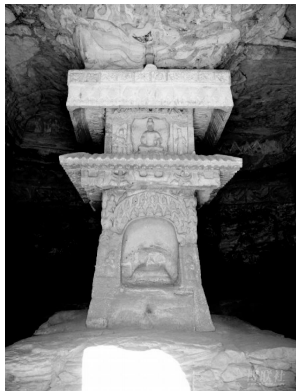


图3 云冈石窟第一窟中心塔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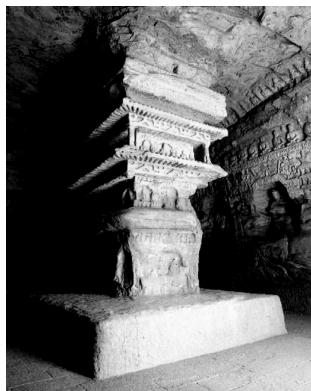


图4 云冈石窟第二窟中心塔柱



图5 云冈石窟第三十九窟中心塔柱

第一窟和第二窟的塔柱,每层四个角都有柱,现在仅第二窟(图4)尚保存一部分。柱断面是方形。

第一窟中心塔柱的布局是双层方塔居中(图3),高5.75米,直抵窟顶。塔由塔基、塔身和塔顶组成。下层塔檐为仿木构屋顶形,具兽头斗拱和四臂天神像。塔顶雕刻须弥山状。

位于东部窟群的一、二窟是典型的塔庙窟,其洞窟的开凿时间应接近北魏孝文帝南迁。该组洞窟共享一个前庭,两窟主室平面似方形,中心塔柱由下设方形基座,中间塔身雕有副阶楼阁,上饰须弥山连接窟顶三部分构成,整个塔柱移植了汉式高楼建筑的艺术造型,具有显着的民族特色。

从对云冈石窟第一窟、第二窟的考察,可以肯定,从建筑形式看,楼阁式中心塔柱结构形式,受印度孔雀王朝支提窟和精舍的影响,结合我国汉地固有的建筑结构体系形成的。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窟中央的方形塔柱与印度原始的佛塔已大大不同,与西域的佛塔也不同,已汉化了。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佛塔之汉化的形象资料。云冈石窟的中心塔柱就是当时楼阁式佛塔的缩影,同时还是同期中心塔型寺庙的体现。

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九层塔柱(图 6)平面也是方形。这四个塔柱因平面小,所以檐下比较简单,没有一斗三升的斗拱、人字拱和额枋。柱是直接支于檐下,上有大坐斗,如同多立克式柱头。

这几个多层的北魏塔型,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底下一层檐部直接托住上一层的阁,中间没有平坐。

第二种塔是壁面上浮雕的塔,普遍见于各窟,种类也最多。有一层塔、三层塔、五层塔和七层塔。塔都有台基。有的塔,塔刹上有相轮五层和宝珠;有的塔,塔刹上却没有相轮五层,没有宝珠。

以上第一种塔和第二种塔是两种形式的塔,虽然表现方法稍有不同,但是所表现的建筑式样,除第六窟等窟有属于一层塔类型的上圆下方的圆顶塔这一



图 6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塔柱上层九层塔柱

种外,全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

从对云冈石窟形制多样的塔的雕刻分析,可以肯定其结构特征在汉民族成熟的木构楼阁建筑基础上,吸收一些外来装饰性的东西,创造发展出了中国自己形式的塔。

云冈塔庙窟源于龟兹的中心塔柱窟。对佛塔重视和塔庙窟的开凿,与当时平城佛寺中以佛塔为中心的寺庙布局设计为同一渊源,仍未突破印度佛寺石窟的格局,而平城大型佛寺与云冈石窟塔庙窟,是北魏艺术家既不盲从外来艺术,又将域外因素作为营养,吸纳融汇到传统艺术的新创造。

从对云冈石窟形制多样的塔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我国汉地固有的建筑结构体系——中国木构楼阁建筑向上递减,在顶上加一个窄塔坡,便成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说佛塔虽然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要的建筑物,传到中华大地,却深刻地本土化、中国化了,变成了这种中印合璧的形式,而在整个结构及外观上来看,中国本土的成分确实是占多数。

总之,在研究分析云冈石窟形制多样的塔之后,可以肯定其结构特征在汉民族成熟的木构楼阁建筑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一些外来装饰性的样式,创造出了中国自己形式独特的塔。

佛塔是佛教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本来是外来的建筑形式,随着佛教从古印度的传入而来到中华大地。从结构特征上来看,云冈石窟中的佛塔,没有照搬它原始的古印度建筑式样,而是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国本土的传统建筑风格,在汉代已经成熟的木构楼阁建筑风格基础上,在汉民族成熟了的木构楼阁建筑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一些外来装饰性的样式,创造出了中国自己形式独特的佛塔。

云冈石窟中许多佛塔的实物和雕刻提供了关于佛塔汉化的确凿证据,折射出印度佛教建筑中国化、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史信息,印证了印度佛教建筑、印度佛教文化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改造之后,才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文化适应现象。

云冈石窟中的佛塔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证据,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印度佛教建筑文化的融合这种历史现象极明晰的物证之一,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吸纳、融合、改造、同化异质文明之旺盛生命力、创造力。这表明,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是有深厚的包容同化异质文明的基础和活力,是不被外来文明所动摇的,也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广阔的胸怀,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融化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外来文明没有动摇中华文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反而丰富了中华文明,激发中华文明的生机和活力,激发中华文明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促进中华文明的转型发展,壮大中华文明的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鲜明特点特性之一就是其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能力很强,中国文化有发达的吸收和消融异质文化的能力。这种吸收和同化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收、改造、消融是最鲜明的例证。中华民族基本上有尊重外来者文化习俗的传统,并不排外。云冈石窟佛塔的本土化、民族化和云冈石窟艺术的本土化充分体现了她惊人的文化包容性。

云冈石窟佛塔经过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和改造之后,成功地实现汉化,成功地转变形态,适应了中国社会的人文环境,推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本土化、民族化,在中国石窟建筑艺术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云冈石窟的佛塔给中国各地的石窟佛塔雕刻树立了一个可以模仿的典范。在北魏之后,中国中原各地区石窟的佛塔,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都受到云冈石窟佛塔形制的影响,能够找到云冈石窟佛塔的影子。

云冈石窟可以说是为我国石窟艺术和世界石窟艺术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主要的价值是推动了石窟艺术的本土化、民族化。

参 考 文 献

- [1] 王恒.云冈石窟[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 [2] 王其均.至尊佛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3] 云冈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4]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